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物之一

時事週評

一，論改組政府 二，台灣民變
三，我們需要安定 四，國民黨三中全會

論辯證法及中國共產黨

莫斯科會議與中國問題

造成政治上的均勢

英國民主政治的演進

「翻身」與「復關」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續四）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

白旭 靜觀 黃撼石 紫雲 丕谷 還俗



殺自於等戰內

再生

弄四八三路州福海上
樓三號九
版出六期星逢每
元百五售期本

時事週評

論改組政府

政府亟盼於最近期間完成全面改組，社會上因之亦就發生了種種傳說，民社青年兩黨分得幾部，某人將任某部部長等等。

如果誠如社會上所傳聞這樣的斤斤於幾個國府委員，幾個部，或是幾個省市的討論，我們真不勝惋惜改組政府的意義的全失。

爲什麼要改組政府？改組政府的目的何在？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把這兩個問題放在腦中思索一番。因爲在今日國事如此危急之際，實不應該再走錯一步路。

和平與民主是今日中國大家所共同努力的目標。而改組政府亦應以這個大目標爲指南針。換句話說，改組政府的意義，應在：擴大民主自由的基礎與建立全國和平團結一的橋樑。

我們不妨提出以下幾個標準，作爲此次改組政府是否有其意義的判斷：

第一：國民黨一黨執政是否真正結束了？

第二：人民雖負有對國家的義務，但是否有各種基本的自由，譬如說，人民是否隨便被軍警特務把你帶走，而逮捕了是否立即審問？發表批評與反對當政政府的言論是否有保障，而不受封禁？

第三：國內自由進步份子拉攏了多少？各民主黨派能否公開活動？

第四：各地基層政治能否改良？民間疾苦能否解除幾株？

第五：平民與官員是否平等？貪官污吏能否懲辦幾個？

第六：法院的審判是否公開，法律是否基於公平的原則？法院是否不受到任何方面的壓力？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標準可舉，不過，我們認爲：如果能夠合於以上幾個標準，則不但可以鋪平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並且可以使全國和平團結一的實現，更爲接近。（毅）

台灣民變

據報載，台灣的民變在日趨擴大之中。「暴徒」所用的武器，除步槍手榴彈外，據說並有小銅炮，同時，國軍二萬人左右亦連日趕往增防，我們認爲局勢相當緊張，當局應該慎重考慮才是。

我們知道，這次台灣民變的起因是由於台胞不滿地方當局的高壓政策所致，所以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還是由改革政治入手，以解民倒懸而平衆憤。

我們記得：早在去年六月，美國時代週刊記者格雷曾批評中國政府爲頑政府的時候，其中有一段就會論到台灣：「台灣人歡迎新來的美國人時說：『你們待日本人比待我們好，你們請日本人受了兩個原子彈，却把中國人送到我們來！』」由此可見，台胞的不滿於陳儀氏及其部屬的官僚政治，爲時已久，現在不過到了總爆發點罷了！（卓）

我們需要安定

自北平抽人後，最近上海的空氣，也甚爲緊張，種種謠言，也隨之產生。

昨天有一位學生來談：「學校中大家不安心讀書，好像暴風雨快要來臨的一樣子」，筆者聽了，心中發生無畏的感觸。

今日現狀的不滿意，是不必諱言的事實。因爲不滿現狀，才求改革，國家社會也就靠了這一點才有所進步。青年人而滿意現狀，老實說，此人前途也就無大出息。所以不滿現狀，正是青年人朝氣勃發的表露，而決不是不健全的病態。然而今日不滿意現狀的，往往很容易隨便帶上一頂帽子，而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不滿於現狀，並不就是共產黨。而共產黨的種種作風和方法，亦並不是我們建國的理想。奈何，今日執政當局，不求減少一般人對之不滿的原因，而往往取高壓政策，而使不滿於現狀的人，大家有「逼上梁山」之感。這豈是一個聰明之舉，適足以造成一般對當局的更反感而已！我們今日所亟需的是安定，在安定狀態之下，一切才能健全發展，而不致走入極端！這才是中國前途之福！（伯）

國民黨三中全会

國民黨三中全会召開期近，各地中委正紛紛望來南京。此次三中全会是國民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會議，是無疑的。

而臨三中全会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國民黨如何結束一黨執政，過渡到多黨政治，而自居於與其他政黨平等的地位。

過去在一黨執政之下，是不容許其他政黨存在的，今後能否將此習慣成自然的唯我獨尊的作風全改，而與其他政黨共同合作，走上民主憲政之路，確是一個問題。

我們打一個譬喻，從前只有自己坐頭等車，其他人只准坐二等車三等車，今後則是大家坐頭等車。欲改變這種封建的舊態度而變成實種民主的新態度，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民黨對民主是否有決心，全看這次三中全会了！（毅）

論辯證法及中國共產黨

白旭

一、前言

這篇文章寫了很久了。許多考慮，顧忌，又使我擱筆躊躇。共產主義，據我的淺薄的認識，在哲學上屬於所謂絕對主義。(Absolutism)這一點或者不至於太錯。相信佛法的人如果見有人將佛法和共產主義相提並論，一定大怒，曰：「你何曾比之于是」？醉心于共產主義的進步少年羞以共產主義與佛法為伍，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我大概天生是個既非正教，又非異端的狂人，在我眼中看來，兩者在思想的典型上，實在沒有分別。既非正教，又非異端的狂人在這個現實世界裏是沒有地位的。在我自己看來，我假如够得上有一星星的哲學思想，我的思想是一種低調的庸人哲學。在客觀方面，恐怕異端看我畢竟是正教一派，而正教看我又又是滿身的異端氣息。這不能不是我最大的，銘心刻骨的悲哀。如生值太平盛世，(所謂盛世，在我看來，便是所謂正教和異端的鬥爭未臻白熱化和尖銳化而已。)像我這樣一個不儒，不佛，不道，為三教所不容的人，充其極，不過不能置身于廟堂之上，不儻于士林名宿之流而已。總應該還有我的安頓處。在這個年頭，便不免有死無葬身之地之虞。這是我擱筆躊躇的第一層原因。第二，當我在解放區裏的時候，交了一位年青的共產黨員的朋友。彼此相敬相愛，相知甚深。那時還沒有發動所謂「清算」，「鬥爭」，但解放區裏已有許多想像不到的奇景。教你從任何一點看，無法了解，也缺少欣賞的能力。我的朋友給我一個欣賞的方法。他說，你看這些人應當如看你自己的孩子。當你的孩子最初牙牙學語的時候，罵你一聲混蛋。你不但以為悔，而且一定抱住他吻一下，心上感到一種甜蜜的喜悅。「這孩子倒會說話了，多可愛」。這段話深深地感動了我。我于是耐心的學習欣賞的能力。但由于我的人格不够偉大，這欣賞的能力很難培養。但有感于這位年青的共產黨人的衛道的熱誠，這熱誠在我心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我關於這一方面的說話不得不異常審慎。近來盟盟某要人所發的「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的議論，我這位朋友的

這段話可以作為理論的基礎。

據我淺薄的了解，凡絕對主義，要否定牠可以全盤否定牠，要肯定牠也可以全盤肯定牠。這是從純理論方面說。如果絕對主義而限于純理論，全盤否定牠或肯定牠都沒有太大的關係，充其極，祇不過幾個書獃子學究闖起門來打一架便完事。我近來不相信談純理論的人其興趣祇限于純理論。連莊子這樣荒唐鬼也還說他是談的內聖外王之道。馬克思的興趣尤偏于實際方面，這是衆人周知的常識。在實踐上推行一種絕對主義，則問題便大了。推行牠的，當然是全盤肯定牠的。全盤肯定牠的，不必清楚牠在理論上的底子，祇覺得這一套做法，先得我心之同然。為了救國家，救民族，祇有這一套做法，為了愛真理，也祇有這一套做法。凡反對這一套做法的，必然是壞人。壞人的種類亦多矣，有國特，有封建遺孽，有各式各樣的頑固分子，遊移分子。反對牠的，當然是全盤否定牠的。全盤否定牠的，也不必清楚牠在理論上的底子，祇覺得在這一套做法之下，他們無所措手足。戰戰兢兢，不敢開口，但又不得不開口；但一開口又準出毛病。在解放區裏，不止一次，有許多謙愿的人向我請教。「我們過去既不曾犯罪，今後又不想有什麼野心，他們和我們又沒有仇，為什麼總是看了我們不順眼？我無以為答，退而思維，祇有用司披拿莎的哲學來解釋，這是應該的。這些人應該受這樣的罪。今天推行絕對主義的人，正在用江淹的彩筆，寫他們空前未有的史詩，阻礙他們的固然認為是人類中的醜惡分子。站在一旁，對於他們偉大的進行曲而表示淡然漠然的，會看成是更醜惡的分子。在這一種情緒之下，這些失去了熱烈的生命力量的，渺小的謙愿份子，隨時隨地受到打擊，豈不是應該的？我這裏所用的「應該」二字的意義，是司披拿莎哲學的意義，不是普通倫理學上的意義。

上文所述，最低限度也可以說，部分的構成了今天火屠殺的場面。所謂「超人」，是不可能有的，超現實是不可能的。但客觀是可能的，不應該受到什麼裁判。假如在人文科學的範圍內不能有自然科學裏所有的客觀，但在這個範圍內也應該極力求客觀，這一點總無可置疑。否則人文科學

根本不能成爲一門科學，人間世便根本是百分之一的一個混帳局面。即使有一個極端的悲觀論者在內心裏完全這樣想法，在道理上，怕也不敢這樣肯定。照目前看，大屠殺的場面祇有繼續下去而不知其所止。雖然原因複雜，一言難盡，上文所述，不失爲構成大屠殺的原因的重要部分。仔細想來，如果了解了絕對主義的性質，離開了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的立場，再來看今天這一幕悲劇，豈不完全是一幕舊劇式的悲劇？假如由於明智的活動而縮短了這兩種人心理上，感情上的距離，這個民族的前途便還有一點希望。我在主觀上覺得這一點很困難。周濂溪有一句話說得最有味，「天下，勢而已矣」。許多事情最難的是已經造成了那門樣一個勢。勢造成了，不願意這樣幹的也非這樣幹不可。既兩種人在心理上，感情上一時無望其能縮短，我將永遠是這樣一個既非正教又非異端的狂人。說任何人不中聽的話，寫任何人不中看的文章。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擇術不可不慎也」夫。

二

我不會讀過馬克思，也不會讀過黑智兒，現在來論辯證法，誠然不免有點狂妄。論有若干種的論法。如果不是引經據典的，學院式的講究，辯證法可以談，任何人可以談，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懂。文字雖然表達道理，但道理本身不是文字。更進一步說，文字何嘗能表達道理？不懂文字的人何嘗沒有道理？

要了解辯證法，要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把辯證法視爲神聖不可侵犯，這須得從兩方面說，一從學理方面說，一從當前的實況說。

先說第二點。中國自清末到現在，歷史所加給這個古老國家的患難是空前的。我在論「國共必須合作」一文裏曾強調的說這句話。我的意思希望凡自命爲醫國手的人物或政黨，都應該特別虛心，特別慎重，以孝子賢孫的精神來體察這位老人的症狀。病到這個分兒，紅樓夢上張太醫有話，「非一朝一夕之故」。

「歷史所加給這個古老國家的患難是空前的」。我認識這一個現象由於幾位前輩先生的暗示。第一是嚴幾道先生。試留心幾道先生的著作，中日的的事情他是預見的。但是他在當時，除了著書以外，和當時那班昏頭昏

腦的官僚說不得。(今天的官僚，其昏頭昏腦如故。)幾道先生的譯述裏除了表現許多精刻的獨見以外，還給我們帶來了滿紙悲觀的氣息。我是同情他的。還有人責備他不該抽鴉片，我說他抽鴉片也是對的。

由幾道先生以後，還有許多深心的學者也認識了這一個現象。

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現象，有沒有深切的認識，深切的體會呢？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也不應該作一個簡單輕率的答覆。我暫時這樣說，據我的了解，在民盟一班領袖中，除梁漱溟先生以外，毛澤東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他們任何人都深刻。(民盟有幾位領袖，簡直沒有認識。)

不過他到底深刻到什麼程度，因爲他是一個實際負責的政治領袖，他的言論文字不能不處處表示樂觀，處處表示有辦法，所以看不出。如果毛澤東先生所表示的樂觀，所表示的有辦法真正是他內心裏的看法，而不是因爲他是實際負責的政治領袖，不得不這樣說，那末，他的深刻似乎便也很有限度。據我看，中國當前的處境，無論站在什麼立場看，不容易樂觀，不容易有辦法。

現在談第一點。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根據黑智兒。黑智兒的辯證法是受了康德哲學的影響。所以這個問題應當從康德說起。

康德是一方面想科正休謨的徹底懷疑論，一方面想糾正盧騷瘋狂的浪漫主義。在這個情形下，惟一的法實當然是訴之於理性。一談到理性，當然就離不開百無一用，一錢不值的演繹邏輯。康德細細的分析了感覺，知覺，和概念，分別了感性的知識和悟性的知識。在感性的知識上安頓了時間和空間，在悟性的知識上安頓了十二範疇。這十二範疇完全是根據演繹邏輯的形式變化出來的。這樣安排得停停當當，科學的知識他認爲是有了保障了。但是康德心裏的問題，不僅止是一個科學知識的問題。還有一個「神」的問題，還有一個道德的問題。換句話說，還有爲我們的時間空間和十二範疇，所對付不了的問題。如果硬將對付經驗的工具施于其上，如果是爲「背反律」所困。所謂「背反律」，便是一束絕對矛盾的命題，似乎同時都可以成立。到底誰是誰非，在經驗和理性上都找不着佐證。康德由此分別知識的世界和實踐的世界截然爲二。黑智兒的一套辯證法便完全從背反律出發。

我在這裏不想對於黑智兒的辯證法多所狡述。我祇想指出幾點。第一

這一套把戲和佛法完全一樣。如不生，不滅，不一，不異，非有想，非無想，非色，非空，都是根據演繹邏輯的矛盾原則在耍戲法。所不同的，是主觀的要求不同。佛法是運用辯證法逆流而上，黑智兒是運用辯證法順流而下。一是消極，而一是積極。馬克思的態度當然是積極的，而其體的內容和黑智兒不同，換句話說，主觀的要求不同。第二，黑智兒似乎很滿意的做一個哲學家。講佛法的人和馬克思和馬克思的信徒都不喜歡哲學家這個稱呼。他們認為哲學便是玄學，而玄學便是胡說。他們所講的都是顛撲不破的，而且祇有這樣講法是顛撲不破的。所以應名爲科學，或科學的哲學。在我看來，「科學的哲學」一名祇能歸於糞素，因爲他祇是告訴我們如何求知，如何理解現有的科學知識和歷史上的系統，他沒有多少成見一定要將世界安排怎樣，他也沒有多少成見，一定要將人類超度到什麼境界。一有主觀的要求，便無法居於科學之列，因爲不管你的主觀要求如何崇高，事實上決沒有法子統一全人類的好惡。講佛法的人希望人人成佛，馬克思主義者希望人人獻身於無產階級，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事實上，想成佛的人是人類中的少數，想做革命戰士的人也是人類中的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是普通人，對普通人只能講普通的道理，不當責之以難能可貴之行。從普通的道理講，不想成佛的人不能目之爲犯罪，他進不了莊嚴的佛土，人間還是他們的。不想做革命的戰士的人，不了解革命的辯證法的人也不能詆之爲醜惡。如一定要詆之爲醜惡，其勢必聚醜惡之羣而詆之，結果是人入皆有可詆之道。試問根據什麼科學定律可以得到「人人皆有可詆」之道的結論？我以爲即便承認佛法的出世哲學和馬克思的革命的辯證法較之糞素一派的分析，批評的哲學有更大的價值和更大的作用，但「科學的哲學」一名斷乎吝而不予。第三，自有非常之人說非常之話，根據非常之話，作非常之事以來，使得常人對於常話，常事，都弄得有點迷糊不清了。自有辯證法，自詭辯證法，運用辯證法的人名辯證法爲辯證邏輯以來，於是發生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庸人自擾的問題。第一，形式邏輯的存廢問題，有人說有了辯證邏輯，形式邏輯可以廢了。第二，有人說邏輯本來就不止一個。張東蓀先生更具體的列出了四種邏輯。第一種說法根本是既不讀書，又不思想，連常識都不具備的耳食之談。然可怪的是其說至今不絕。足徵這個民族的昏妄已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尤可怪的是最近「中

堅」雜誌上有一批反共專家也痛罵形式邏輯。若似乎不罵形式邏輯便不足以表示其進步。本來了解了這些問題不足稱專家學者。然而連這些問題都不了解，便要昂首伸眉，論列是非，豈不活生生的羞煞人也要哥？現在爲正名實起見，說邏輯止有一個。這一個便是確無用處，人人不學而能的形式邏輯。東蓀先生之說，旨在隨順時俗，不必有系于真理。形式邏輯是語言文字的骨頭，是經驗對象所以可能的保證，是向經驗界探路的電火。至于辯證法，是根據演繹邏輯的一種變態的運用，其目的在用語言文字來表示語言文字所不能表示的境界。非常之人用這個來達到他主觀方面的非常要求，其內容或是向前進的，革命的哲學，或是向後退的，出世的哲學。其內容有得失可言，有是非可說，不過得失很難言，是非很難說。至于邏輯本身，無內容，無得失，無是非。牠是語言文字的骨頭，是說話的條件，而牠本身不會說話。你的話精彩絕倫，不是牠的功，你的話荒謬絕倫，也不是牠的過。第四，我現在要指出辯證法並不難懂，人類隨時隨地都在用辯證法。尤其今天的中國，人人都在用辯證法，不限於中國共產黨，不過非共產黨人的運用辯證法，其內容和共產黨人完全不同，但方法是一樣的。這證明了在這個焦頭爛額的狀態下，是中國人都活不下去。在非常的時候，無可奈何的環境下，對於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作一個簡單的表示。歎而息乎？又不可可能。在這個情況之下，祇能說些似通不通的怪話。照形式邏輯講，「這是甲」這句話可以成立。「這是甲而又不是甲」這句話是自相矛盾的，是不通的。照辯證法講，「這是甲」是孤陰不生，「這不是甲」是獨陽不長。「這必須是甲而又不是甲」。必須綜合甲與非甲，這裏面才有新生命。在綜合的過程之中有取，有捨，捨即是所謂揚棄。第一個命題是甲，第二個命題是非甲，第三個命題是非甲非非甲。這樣不斷的以否定的方式綜合下去，使生命日即於富有日新的境界。

這一套道理我認爲對於一個中國人並不生疏。人類已有幾千年的文化史。今後經驗科學的前途無人能預測其所至。至於理性上的把戲未必再有什麼新花樣。不過講法和各種典型的理論的配合取捨，容有變化而已。最近懷特海的新形而上學還不是司披拿沙，黑智兒的一付架子？不過按其精神，按其結構，按其意味，按其面目，均迥乎不同。我認爲辯證法所談的是很通常的形而上學上的道理。中，外，古，今的哲人，有所窺見於此

的，為數亦甚多。但是由於中國當前環境的特別困難，任何一個階層的人都是焦頭爛額，無路可走。任你如何想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也做不起個人來。辯證法在這個實際狀況下運用的結果，便顯得非常乖謬可笑。再作深一層的想法，這不是可笑，而是可悲的。無往不用辯證法，便是無往而不焦頭爛額。人人都用辯證法，便是人人都焦頭爛額。整個的時代陷在大矛盾中而不能自拔。

何以見得人人都在用辯證法呢？先舉一則例子。七七事變前，察北的風雲已經一步緊一步，暴日生起的風波，一個接一個。汪精衛當時任行政院長。他宣佈的方針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這句話表示他對日毫無辦法，而他的地位又不能允許他說毫無辦法。他的地位又不能允許他不說話。結果，說了這樣一句不通的怪話。在他想，單交涉不行，單抵抗又不够，必須綜合二者才能給中國打開一條生路。結果是交涉沖淡了抵抗，抵抗又妨礙了交涉。辯證的結果是不合而離，弄成一個不牛不馬，四不像的政策。

鄉村裏有一等類似兒女英雄裏安二老爺的典亞的人物。有妻，有子，或者還有一個妾。一般的收租，放息；間或也修橋，補路；也看看太上感應，安土全書。說他們有什麼大壞處麼？很難說，論到積極的道德却全沒有分；但在鄉里却最有善人之目。這一等人在鄉村裏眼目皆是。他們自封為「在塵出塵」。實質上，也是不牛不馬，四不像的人物。

共產黨在解放區裏對付農工以外的所謂士紳地主，是用的一面拉攏，一面打擊的政策，或者叫做上層拉攏，下層打擊的政策。他們根據馬克思的辯證法，認為今天中國有希望的祇有無產階級，士紳地主是一個沒落階層，應該屬於被否定之列。祇有無產階級抬起來，這個民族才有新生命。據他們的分析，士紳地主這個階層，現在正務復於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和代表寡頭金融資本家的國民黨之間。我的共產黨的朋友對我說，「任何一個階層，你不保護他的利益，而侵害他的利益，他沒法跟着你走的。空講些道德仁義的話全不相干」。士紳地主在今天雖是一個沒落的階層，但依然有不可侮的消極的潛勢力。這一點，共產黨是有所體會的。所以必須拉攏，不讓牠投入代表寡頭資本家的國民黨的懷抱。但又必須打擊，否則無產階級便抬不起頭，革命的主力便抬不起頭。在一面拉攏，一

面打擊的政策之下，淘汰士紳地主中的頑固分子，吸收其中的開明進步分子，統一於工農無產者的主力陣綫，於是乎一個活潑新鮮的少年中國便站起來了。

這一套想法在共產黨人認為是天經地義，在反共的人當然認為是荒謬絕倫。我以為其言甚美，但想法是想法，做法是做法。在實踐這一套政策，共產黨在蘇北是失敗了。在其他地區非我所知。這一套想法如果全盤兌現了，當然成就一種驚天動地的偉業，做法不好，結果也是一種令人看了莫明其妙，非牛非馬的四不像的東西。和汪精衛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鄉村裏老員外的「在塵出塵」一樣可笑可悲。

姑假定這一套想法在理論上絕無問題，在實踐上，這一面拉攏，一面打擊的兩面政策，在運用時決不能過火，方能收統一之效。否則拉攏成為偽善的禮貌，打擊成為獸性的衝動。越打擊，他固然越恨你，越拉攏，他也越恨你。如果說共產黨根本瞧不起這個沒落的階級，恨不恨沒有關係，那便甘願一味打擊便完了，更無復標榜拉攏的必要。不過火，收效當然不能太快，應該淘汰的分子不能一下子淘汰完，不能一下子消滅這一個階層，但是有幾千年歷史養成的，在今天是不合理的傳統，不合理的古老制度，如果一下子便能澈底的，全盤顛覆，應該不應該有這樣的奇跡？如果共產黨有這樣的熱情，我惟有合十贊美。如果共產黨確有這樣的野心，那便是十足的主觀唯心論者。

「這是甲」，和「這是甲又是非甲，非非甲」，這兩句話必須同時成立。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範圍。如果「這是甲而又非甲非非甲」，那末，上一秒鐘的我，不是下一秒鐘的我，不斷的在自我否定的狀態中，試問人與人的關係如何建樹？人與人的起碼的關係無法建樹，這世界還能一朝居麼？蔽於變而不知不變，說「這是甲」這一種說話的形式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武器是一種瘋狂的態度，是一種瘋狂的哲學。

我並不否認瘋狂的哲學有其甚大的價值，我用瘋狂一名不必有諷罵，詆毀的意思。但是根據這樣瘋狂的哲學來施設政策，有什麼理由希望一班人理解，接受？這底下的問題便太大了，在解放區裏，皇皇文告貼在牆上，甚易知，甚易行，甚為近情近理，但實際上所做的全不是這回事。上級幹部對人談的，所希望於人的，甚易知，甚易行，甚為近情近理。但下級

所執行的又全不是這回事。如果一次兩次，一件兩件，還沒有什麼。回如此，條件如此，自然結果是怨聲載道，流亡遍地。共產黨平心靜氣的思想，造成這樣的現象，能不能完全歸咎於這些人而不共產黨合作？不是以土豪，劣紳，頑固，不進步，這些不美的名目往這些人身上一加，問題便算解答？

土豪，劣紳，這一輩，受了共產黨瘋狂作風的嚴重打擊，這是事實，當然沒有一個有新鮮生命的人對他們同情。所可議者，這些人在鄉里之間的罪行都彰彰在人耳目。共產黨起來，為什麼不以正常的法律手續予以打擊？如果這樣，分明更能取得廣大人民的普遍同情。我所最關心的是在瘋狂的作風之下，有一種靠了自己的勤勞，心血，和些微的資本而積得些微財產的人，這便是某一位英雄喻為兩條火龍鬥爭中間老鼠一般的人。這種人，用葉子張背對武二郎說的一句話，「享用得並不會過分」，可是也蒙受了嚴重的打擊。這班人裏包括得有小地主，富農，和小規模的工商企業家。他們所以能有一點財富，全由於省吃，儉用；他們通不到官方的聲氣，對於土豪劣紳這不免要有例規的孝敬。不特別保護這個階層，反而打擊他們是不能够替天行道，不能够代天立言的。

共產黨，在另一方面，又是承認「這是甲」的說話形式的。他一口咬定了蔣先生的「四項諾言」。不久的過去，延安的宣言，三致意焉於恢復黨與黨之間的信託。這個矛盾怎樣理解呢？本來相信辯證法的人認為這是天言，天行。把握住天言，天行的人是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是替天行道的「大人」。我有特權這樣說，這樣做，因為我有一個革命的大目的。你如果也想享受這分特權，你便得和我一樣，懂得我內心裏這點微妙的意思，完成我內心裏的神聖目的，否則是不可以的。這並不奇怪，也不是新鮮的道理，是絕對主義的古老傳統，一貫作風。絕對主義表現在宗教上，倫理上，政治上，都是這面目。佛在阿合經上說，「衆生見我說教，執以為有，衆生不解我意，我無如之何也。衆生見我說空，又以爲空，衆生不解我意，我無如之何也」。這段話正確的解釋是這樣：你如果懂得我的意思，說有說空隨你便，你如果不懂得我的意思，說有說空全不對。這不成了法西斯專制魔王了麼？不是，因為我的意思是天的意思，我的目的是天的目的，我是行的大乘菩薩的「權變」。孟子在倫理方面推演這

番意思。「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義是道德上的最高原則，然而義是活的，我已經把握住了義之所在，所以拍馬吹牛，無往而不合乎義，無往而不是大人。你不能，所以你雖然言必信，行必果，你還是個小人，假如你言不信，行不果，你更是個小人，要根據這信行果的標準來打擊你。

在解放區裏，共產黨人和擁護共產黨的人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及堅決反對共產黨的人，各有各的天地。這一點，倒很可以說明唯識家一切唯識所變的道理。我以為，在今天，說共產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掛羊頭，賣狗肉，似乎是可以說的。說他堅苦卓絕，哀離離奇，似乎也是可以說的。不過這些話說了都沒有多大的意義。相信絕對主義的人，在情緒上，絕不和普通人一樣。他的愛，和他的恨，都另是一番意味。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國人應當以正確而深刻的理解，來代替對共產黨的愛和恨。沒有共產黨那一種絕對主義的宗教情緒而滾熱的捧場者是「昏子」，受了共產黨的困惱，在莫明其妙的「鬥爭」，「清算」裏失去了一切，因此大罵共產黨的人也是如來所謂「可憐憫者」。

羅素在美國和一個美國共產黨人辯論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曾有過這樣的批評：馬克思的公式太簡單，不足以範疇當前世界萬事萬物之變。這句話是對的。左派的人物都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嘗說真理是簡單的，祇須一切爲了人民。說來說去，祇這樣一句粗樸的老話。不錯，真理是簡單的，祇須一切爲了人民，但方法如何呢？原則可以是簡單的，方法決不能是簡單的。

上文已經說過，共產黨對農階級以外的人，用一面拉攏，一面打擊的政策，企圖最後將一切力量全統一於農階級，而這個階級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我在上文，單單指出，最低限度，這企圖在蘇北是失敗了。失敗還不止於此。所謂農階級這一個名詞當然指日着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在中國社會裏，到底從那兒起，到那兒止，並沒有有一個清清楚楚的邊際，祇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大體的輪廓。產業工人更不必說，產業根本不會發達，談不上產業工人。農人中有富農，中農，貧農；還有流氓農民，這是人類中最要不得的一種人。好吃，懶做，愚頑，殘酷，自私，欺詐，所有的醜惡的名詞都可以加在這一等人身上。共產黨對於這等人頗加青眼，

這是我所最不能欣賞，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在「清算」，「鬥爭」的運動中，流氓農民是急先鋒，其清算鬥爭的對象，不但包括了富農，連中農有時都備備不能自保。這是最荒謬的一件事。我以為流氓農民之所以鬧得穿吃無着，社會制度應負的責任小，他們本身應負的責任大。這和讀書人一到沒有辦法，便嘆息懷才不遇同樣的無恥可笑。現在的社會不讓人才出頭是一件事，庸碌無能者盤據要津是一件事，但沒有辦法，不得出人才出頭的並不是人才。獎勵流氓農民是一件犯罪的事。

莊子說得好，「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共產黨想把國家民族所有的力量統一於農階級，但是在辯證法無限制的運用之下，這所謂「農階級好像到了一層，割了一層，又是一層，割到最後，好像祇剩下貧農和流氓農民。如果憑這個力量想統一吸受貧農和流氓農民以外的一切優秀分子，完成革新的大業，恐怕決無是處。優秀分子既不能統一吸受，共產黨所要打擊，要淘汰的分子，也是本來應該打擊，應該淘汰的分子，便打擊不動，便淘汰不了。

我所看到，正是蘇北的情形。據到過延安的朋友談，那邊的情形不是這樣。我認為就蘇北的情形而論，共產黨很糟，而且無能。華中版的新華日報記載了下面一段事：有一個村莊，有兩三家富農，其餘都是中農和貧農，有一家地主。什麼會，什麼公開的活動，富農都不參加。高級幹部來了，問他們為什麼不參加？富農說：「他們（指中農與貧農）不要我們，說民主政府不要我們」。「不，要你們的」，幹部說。

偶然看見這一段，日期記不清，報紙也沒有保存。這一件事我認為說明幾點。一、把一切都排斥於民主政府之外，共產黨不能若是之愚悍。二、在層層剝削的政策之下，民主政府實在沒有法子保護富農乃至一切人的合法權益。結果是造成重重的對立，層層的矛盾，民主政府沒有法子把握這些對立，統一這些矛盾。結果是力量的分散，殺的殺，逃的逃，流亡遍地，怨氣沖天，使共產黨的政治威信受了嚴重的，不可估計的損失。

我不是馬列主義的信徒，但有許多地方和共產黨的看法並不兩樣。中國今天的大問題祇有兩個。不進步的，不合理的傳統制度拖住兩條腿，進步的，外國的產業勢力拖住了咽喉，在這個情形下，一個人不做古奴，便要做洋奴。兩者都不做，便要受靈魂上的酷刑。這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共

同命運，這豈是某一個階級的問題？中國今天什麼都不成樣，一切都不够格。中國的資產階級固然先天不足，疲軟無力，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這一幫洋奴固然不配和洛克斐樂並坐在一個殿堂裏，共產黨所代表的無產階級，尚未足月，又何嘗不疲軟無力？再嚴格說一句，中國那裏有無產階級？中國人吃不飽是真的，面黃肌瘦是真的，那裏有專門術語意義的無產階級？

辯證法既不是科學，也不是「太上老君，急急如令」的符咒，是窮則呼天，急則呼父母的一種呼喊的聲音。決不可能無限制的運用辯證法，決不可能無往而不鬥爭。以為祇須把握了辯證法便能保證最後必然勝利，是一種荒誕的迷信。迷信可以發生力量；比這個更荒誕十倍，百倍的迷信都可以發生力量，這沒有什麼稀奇。力量本身當然便是價值，但是如果要用這力量產生怎樣的成果，用這個標準來估價，在今天，對於共產黨還不能予以肯定的估價。

所謂「清算」，「坦白」，在原則上都是對的，在動機上也是好的。須是自發的，這個方法最多可以用之於共產黨的幹部，而不能用之於一班人。末日審判照宗教上說，這是上帝的權衡。「齊人伐燕，或曰：燕可伐歟？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從這裏，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出共產黨自居於何等。但是我不相信流氓農民有什麼資格向任何人清算，即使被清算的對象是土豪劣紳。這一羣是民族的渣滓，是自暴自棄的天天之輩。而真正吃土豪劣紳虧苦的貧農和中農，在所謂清算運動的浪潮中，並沒有勇氣站在第一線。我以為所謂「清算」，「坦白」，都是行之有百弊而無一利的事。這都是宗教和道德的做法，這是對內的，不是對外的。我不曉得共產黨有什麼理由肯定他的下級幹部都是好人，都是天吏。我確知這裏面的罪惡，黑暗是一言難盡的。

由於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和他所憎恨的階級同樣的疲軟無力，所以矛盾的對立物無法克服，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向後去畢竟如何，我既不是神，當然無法預測，從大體上說，這個民族前途的氣象，殊不見佳。人民一天比一天窮，經濟危機的道理。在解放區裏，人民日習於卑污苟賤，普遍的德性一天比一天敗壞。如果內在的力量不能克服這個矛盾，又不肯改弦更張，另覓解決問題的路子，曠日持久，底下的話我不能再說了。晚明的史乘似乎可以資為借鑑，成功的不是明思宗，也不是李闖王，而是異族的滿人。

莫斯科會議與中國問題

解 觀

舉世矚目的四強外長會議，已在莫斯科正式揭幕。這個會議的預定議程，固以討論德奧和約為主，但同時必涉及許多其他的國際問題，中國問題恐也在討論之列。

我國政府為預防這個會議或將有不利於我的決議，最初曾要求出席，卒因蘇聯反對作罷。最近乃照會參與會議的四國政府，聲明莫斯科會議倘討論及德奧和約以外的其他問題，事前應得中國同意，否則將不接受其約束。

我們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對於我國政府這種舉措，在理論上自無間言。良以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對其本國問題，自無容他國越俎代庖，否則不但有辱國格，且將啓國際干涉之漸，這還是誰都不願意接受的。

不過，我們若從事實上觀察，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莫斯科會議將討論中國問題，殆已成爲一般有識者的定論。儘管我們曾照會與會各國聲明反對，但如時間准許，與會各國代表對其主要議程又不致發生意外波折的話，則至少非正式討論殆屬難免。

不錯，根據十四個月前美蘇英三國外長所公布的莫斯科宣言，三國原會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它們對其自己所宣佈的意見，當然願意遵守。無如十四個月過去了，而我國的局勢，不但未稍見改善，反而更形惡化。十四個月前我國內戰雖也未停，但和談未斷，總算尚可給人以一線生機。今天的局面確已演變到全盤決裂，和談之門既已重重堵煞，難望再啓，內戰乃如脫韁之馬，一發難收。所以今日中國的問題，狹義言之，固可說是個有類兄弟鬩牆的內爭，但廣義言之，也未始不可被人解作可能演成爲世界大戰的專火線。果爾。則以一個謀世界和平以職志的國際會議——若莫斯科會議講者，即有權提出討論，初必不因我們當事人的一紙照會，便冷眼旁觀或竟熟視無睹起來。

不信，請看英外相貝文於上月廿七日在下院外交辯論會中對中國問題所表示的意見。貝文說：「使用神戰戰、內戰等一類之方法，極易成爲普

遍戰爭的主要因素。武力一發，各種一端，就世界和平觀點而論，這是極危險的武器，不可玩弄。我們切盼各政治當局爲全世界人民計，應盡力予以避免，而勿予以鼓勵，庶危局可以結束。」其弦外之音，顯然已不把中國問題，僅僅作爲中國內政的問題了。

作爲四強外長會議主角之一的貝文，其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既明顯如此，其他若美蘇法三國外長的態度又何莫不然？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態度是用不着詳細分析的。他過去十三個月在華躬與調解國共糾紛的痛苦經驗，應可使他深切體會到這個問題的如何嚴重。他的離華聲明對國共雙方所施的譴責，至今猶昭彰在人耳目。所以他代表美國調解國共糾紛的失敗，很可能使他走向國際調解的路線。

蘇聯克姆林宮的態度是一向保持緘默的，但其對於我國政府在內戰中所處的地位，早已怒形於色，無可諱言。若干代表官方的報紙若真理報及消息報，且會一再加以無情的抨擊。最初反對我國要求出席莫斯科會議的是蘇聯，最近延不答覆我國照會的也是蘇聯。行動當然比言詞響亮。所以它的對於中國問題的態度，是最顯而易見的。何怪有人說，這次莫斯科會議第一個把中國問題提出討論的，說不定也就是它了。當然美國也有可能。

至於法國的態度。法國對於我國雖關係較淺，但也一直在關心我們的問題。加以法國在西班牙內戰中富有實地經驗，知道一國的內戰對於世界和平的威脅最切。且會一度亡國，受到戰爭的痛苦最深。覆轍俱在，來軫方道，以彼例此，能不驚心怵目！所以它的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也是不實而喻的。

中國問題已不僅是一個中國國內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係着全世界和平的問題，四國既有共同的認識，那末，以一個完全爲此四大強國外長所組成的莫斯科會議，又怎能禁其不提出討論？也許其討論方式，經過此次我方以照會通知有關各國後，容有什麼變更，或自正式改成非正式，或自公

造成政治上的均勢

黃·撼·石

民社黨諸君終于毅然參加擴大的四機構了。對於這次重大的措置，因為它已經成爲既成事實，我們自然無庸再就得失的問題多事評論。國事的前途所留下僅僅這一綫的觀望：泥足而不能自拔？抑或佐而促成其大業？這即將面臨的現實畢竟太重要了，沒有特別提高自己的警覺性，就難去適應一次大膽和冒險的嘗試，因為政黨政治是否成功，常常是取決於十字交鋒途途之上，而中國今日的情勢是否改觀，也有賴於一連串「奇蹟」的出現，爲了這樣的理由，我們不能不「臨表涕泣」於左右了。

法國古諺說：「瞭解一切就會原諒一切」，諸君今日所抱的苦衷也正如大多數良善的中國人一樣懷着憂憤的情緒準備踏上創業的旅途，並昭告昊天上帝曰：「克明俊德，毋負己躬」。除了憤世疾俗的主義者才會認爲所有「做官」的人都是罪人，一個具有高度理解力的人通常總是對於新陳代謝懷着希望的憧憬。然而，事實却偏偏那機遇，有史以來的觀察家都承認：「有德行的入一旦從政，往往就變成無賴」，當前掌握中國大局的顯要們大半都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他們的熱血真的冷了麼？他們的誓願往那裏去？彼等當年之所以起而奮鬥的堂皇富麗的理想，却甘心付之一炬！那麼，歷史會重演嗎？我們只好忍耐等待事實的明證。

筆者雖然不敢冒稱愛國之士，更不敢說

言聾聽。但中國今日必須推翻封建統治，以及建立一個真正足以代表全體人民的聯合政府，實非感情的用事，而乃爲普通常識的判斷。凡一個肯用頭腦的人總會覺得：如果中國全面的和平不能倖致，則無論爭取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都是難以想像的，何況目前統制的愈來愈兇和官僚資本的根深蒂固，我們還敢對未來的憲政做着海闊天空的夢嗎？所以，爲使中國尋求可能的藥石計，則「悲觀的想像，和勇敢的行動」將比無知樂觀的催眠藥或對於事實更爲有益些。倘若諸君認爲筆者所畫的一幅當前政治的圖案過於灰色，而又能指出相反的明證，那我將如何歡喜去改變自己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是什麼？廣大的羣衆是不知道的，法西斯是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是：他們的一生可以生活於快樂的國土上，衣食無憂，並遺忘了戰爭所賜予的骨肉的離散。中國當前中產階級的潰落，更加深了這種的趨勢。做一個政治家僅僅依靠道德與良心是不够的，因爲「管理衆人的事」需要明睿的智慧和勇氣，不斷地去面臨必然的轉變，筆者不揣冒昧，擬在下面貢獻三點意見：

一、所謂抑強扶弱的精神——各黨派參加了政府之後，表面上似乎已經民主了；在對外的關係上，中國好像也不再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

開變成秘密，但這問題遲早終必涉及却無可疑，正式的公開的討論，對於我國面子上固屬難堪，但其害尙馬上可見。至若非正式的秘密的討論，其損害我國主權反祇有更甚。我們不能自作聰明，效沙漠裏駝鳥的作風，老把自己的頭鑽在沙裏，眼睛看不見旁人，以爲旁人即可不來打交道。我們也不能一面仍在朝起門來大打其內戰，自己人民的痛苦可以不管，外人的忠言可以不聞，一面却要以一紙照會通知各國勿來干涉，以爲從此別國便會真的不來討論我們的問題。

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們現在也可以說，「若要人不管，除非己莫爭。」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今日中國問題所以會成爲國際討論的要目之一，我方實有其自取之道，夫復奚尤？若我們自己不知悔敵，儘管我國政府發出一百個照會，儘管有人發動一千個「愛國護權運動」，其無補於事實則一。因爲我們現在不但沒有停止我們的內戰，內戰反而祇有越打越擴大，越打越不成話了。長此以往，我國問題既不能自行解決，外人的勸告發發文都不成，那末，最後的一着，當然祇有聽候國際干涉了。這可不能怪人家之太好管閒事，祇好怪自家的太不掙氣。

我們的態度很明顯，我們決不那樣的喪心病狂，自己的事情自己不能解決，反妄圖慫恿旁人出來干涉。但是同時我們也不那樣的顛覆，對於還未一個關聯着世界和平的重大問題，自己竟不知趕快起來解決，自己闖下了滔天大罪而不知怎樣收拾，反一味祇想阻止人家來幫同救火。

我們以爲我國目前一個最有效的教莫斯科會議勿來討論中國問題的照會，一個最有益的愛國護權運動，莫過於大家趕快先來停止正在日益擴大中的內戰！（三月九日）

其實，除非我甘自出賣，有誰願意俯首就戴？處此亂世的年頭，民主只是一面幌子，搖了一下又被收斂起來。那邊震耳欲聾的砲聲，我們能够居然忘掉一個「王之反對黨」還在門外從事劇烈的鬥爭嗎？筆者以為：共產黨之所以為共產黨也正如民社黨之所以為民社黨，彼此都有其歷史的條件和環境的需要；這也好像官僚之所以成為官僚是因為腐化和統治慾濫固的結果。易言之，一個粗獷的鐵錘（指二十年來有增無已的封建統治）盲目地到處亂撞，它終會由于力的抗拒而冒出劇烈的火花和響徹的爆炸，結果，火勢就不免燎原了。不錯，我們也得承認：共產黨一旦執政，所謂政治民主只有在字典上才可以找到，但，如果拿一個經濟民主和另一個既無經濟平等又無政治民主的制度比較一下，那顯然前者略為好些；如果同時假定共產黨被消滅了，「集天下兵器於咸陽，以為從此可以無事」，這是可能的事嗎？相反的，我們恐怕那時的民社黨，民主同盟，甚至青年黨都要再度潛到地下去活動了。照這樣的道理來說，共產黨既不可能消滅，剩下來最後的一條路就只有爭取和平，迅速促進真正聯合政府的實現，它的方法，除了造成政治上的均勢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使國共雙方和第三黨的力量是平衡起來，換句話說：「一面倒」的形勢絕對不能挽救當前的和平，而第三黨自身的分裂更減低了可資左右的力量。自然，民社黨是有其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社會化的政綱，它不會投入左方，也不會投入右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相信「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可以實行於眼前的中國，但如何才可以達到政治上的均勢？捨抑強扶弱外，沒

有他途，政治均勢一日不能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都不是健全的。三十年後的中國將走上那一條路，我們現在不必去理它，因為由真正的聯合政府過渡到另一種政府，武力已經不是重要的工具了。

二、「革命」是可怕的嗎？——革命這一個名詞常常會嚇壞了獨裁者，事實上，革命不一定是指領導一羣狂熱的徒衆到衙門去吶喊，照赫胥黎氏的意思：「它是構成人類生活的思想與制度的急劇的轉變」，在目前，替中國爭取民主的法律固然是我們的職責，但是，在這種撥亂反治的律度之下，用胡適博士所謂：「一點一滴的改良」的方法實在太過靠不住，語云：「治絲益紊」，所以不能「抽絲理之」，如何才能撥亂反治？有賴於我們對於事物傳統觀念的急迅轉變，同時，表現在行動上是一連串從未有的「奇蹟」出現。譬如說：監察委員諸君，有打「老虎」的勇氣吧？現在的中國，無虎而不老，無老而不惡。既出山，就得做武松，不然，只能做到獨善其身的地步，我們認為不如高臥隆中還做得乾脆，何必冒此偌大的危險呢！要之，人民對於政府的萬花筒已經看膩了，只有火蛾才會自投火網而死，否則，一面既不利於禍源誘，一面又保留着自已逃避餘裕的地步，我想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司徒大使所說的「再一次革命」也許可以從此開其端倪，而大家所不願意看的流血革命才有辦法避免。

三、在野時的政治風度是怎樣？——在參政的諸君之中，有許多人的文章，筆者對之並不陌生，而且還時時受到贊詞的鼓舞。這般人現在挾着

批評執政者的善良之心也踏上政治的舞台上考驗下自己，我們自然不敢妄存希望，以為他們所做的事將完無瑕！當了家的人才知道柴米貴，負責任的政治無暇！在野的批評家或論家其中是存在着特殊技術上的差別，但二者却是互為表裏的。今天諸君以立人之心立己，則他日繼起而批評諸君之人，必不至再受「橫眉怒目」之苦，古人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一個具有民主素養的政治家常常能為真理服務，而真理的可貴却在於不分黨同，摺衷納衆，共同發現其可用之處。在我們的國家中，數十年來「排排主義」的形成不是事出無因的，工業的落後，使每一個人的觀念固於狹隘的區域中，再加上傳統「宗法」的遺毒，便構成了今日因人成事而毫無效率可言的政治制度。倘若這種惡習仍然存在於一羣新進自由份子的腦海中，那麼，一代不如一代的實際將使這個國家永遠沉淪下去，到頭來，大家的事業也從此斷送了。在今日，帝國主義者的懸機，似乎已經沒有希望，而官僚的威風，其本身既為沒落所腐蝕，也似乎沒有生路，今日唯一足以解救危殆的源泉，我們可以有之於覺醒的民間，也可以得之於在野的政黨，假使我們抱着同樣不變的初衷和勇氣踏上險阻的荆棘的話。

最後，筆者想引巴金先生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血不能白流，痛苦不至沒有抵償，犧牲不會徒然」，我們願在還暴風雨的日子，過完了寂穆的夜晚，保留着細聆各方教益的樂趣。三月三日于南京

英國民主政治的演進

紫雲

英國是在她長期的政治發展的最後一個時期裏，才在政治基礎上變成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許多世紀以來，牠就有着一個立憲的代議政體。不過在政權平衡上一直到一八三二年的改革令的時候，還是一個大陸上的獨裁政體。到了一八六七年是一個中等社會的政府的形式，有着一個混合的職業的，實業的，財閥的姿態，此後因為有了普及於一般戶主的選舉，可以被稱作民主政治了，但那到底還是一種有限度的民主政治，許多男子和所有的婦女都仍舊在選舉圈外。直到上次戰爭期間和戰後，方進行了最後的進程，實行所有成年人不分性別的普選。

然而要想達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還需要普選以外的東西。選舉權如果不能表示並擴大那種沒有選舉權即已存在的政治趣味和勢力的話，對於執政者簡直就成了一种禮物——尤其對於獨裁式的執政者。一八六七年的這種有限度的民主政治，倒比當時建立在普選上的政治，更接近真正的民主。現在的普選比之未曾經過中間普及教育並推進種種傳達，發展政治趣味及知識的自由結社的那種普選，是更有效果了。

於一八三二，一八六七及一九一八年間被允許投票的一些社會階層，是在他們通過了政府機關以外的自由結社，和政治上的覺醒之後，才得到投票權的。

英國的憲法是一塊一塊逐漸堆砌起來的，每塊新磚都是用外界的努力，預先製作出來的，而且總是要在發現舊建築基礎的足夠穩固並能經得起過分使用的時候，才被加添上去，這就是英國憲法的構成的特點。

無疑地，如此發展下來的議會的民主，在能力上與實際上，逐漸得到的收穫，要多過於它在時間上的損失的。的確，那些最熱烈渴望着真正民主政治的人們的主要焦慮是担心最後的一個階段或許會太快，担心大部分教育不良，經驗不足的人濫用選舉權而使真正的民意被阻撓。可是由於政府機關在其本身以外的公共活動上有了限度，這種危險是大量的消滅了。也就是說：這種危險已為各種因公利益而成立的私人組織所彌補了。

自由結社裏所獲得的訓練與經驗，以及他們對於選舉區及議會的影響，構成了英國民主政治的本質。

就是這些東西，區別了英國的民主政治和一九一九年德國魏瑪共和國那樣的紙上的民主政治。魏瑪共和國表現的，不過是一個表面。在它的背後，國家的一些真實的力量在組織着，並強大到了足以摧毀這個共和國為止。

英國的議會民主政治遵照着國家的經濟情形及社會生活的變遷而改變着，尤其是干涉主義的消滅，和戰爭危機的增長，這兩大要素已經使本世紀的民主與上世紀的民主予以區別。整個十九世紀，政府與議會都主要地和政治的選舉權的授予有關的，無能的排除，選舉權的擴展，愛爾蘭人的地方自治；對上議院選舉權的約束；殖民地自治政府的進步。戰爭與戰爭的恐怖只不過有偶然的間斷，外國的政策對於議會及一般人民只是一種疏遠的偶然的趣味。最主要的，財政在法律的金融的以及工廠法的組織之內自衛反抗欺騙，國家不會作什麼事來管制經濟企業或確立社會的安定。

這一切都改變了，現在佔據着英國政府議會和新聞界的，都是一些關於對外政策的問題，除此以外就是國家以各種方式在實業方面及社會改革方面參與實際的大部分工作的問題。這件事曾經深深地改變了議會與政府的關係，以及議會的工作，議院法和議員們應有的資格的問題。

議會現在還沒有充分地適應於它新的而且是與前極不相同的工作。議院法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改革，它特別需要找到一個使它能控制其主要原則，以及經濟的法律的特性的議院法，而不必把它的有價的時間表內過度地裝載了一些細節。

可是民主還包括政府以外的東西，為瞭解民主在這個國度裏是什麼樣子，我們需要有一張關於整個有組織的社會的寫生畫。除去了少數的例外，實業依然是被私人企業所操縱，不過已經達到一個大的而且迅速增加的

「翻身」與「復關」

丕谷

勝利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內，全力倡導和實行的所謂「工農翻身運動」，為時僅及一載，毀譽參半，紛擾迭起，誠如中共自己所說的：「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運動」。與這個運動同時，有在國民黨一手扶植之下的所謂「流亡難民協會」，「武裝還鄉團」等等組織的出現——他們是在「翻身運動」的巨浪中，為解放區的刑場和牢獄的威脅，從老家裏流亡出來的。現在又打回自己的家鄉——解放區而去了。報桃報李，一往一來，也同樣的以刑場和牢獄，奉還昔日的那些「翻身」英雄，中共方面則謂之為「地主復關運動」。當然，在這兩次大運動中的殺來殺去，並不盡是「復關」的被殺於「翻身」的，或「翻身」的被殺於「復關」的；還有「復關」的當作「翻身」的，被殺於「復關」的，「翻身」的當作「復關」的，被殺於「翻身」的；或既不「翻身」也不「復關」的，當作某一方面，被殺於「翻身」的或「復關」的；或根本不當什麼被殺掉了——漂流得最多的最慘的還是無辜者的廉價的鮮血！

我們暫不論雙方的是非曲直，功過得失，總之成為中國目前政治上的，甚至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件驚人的大事，殆無疑問的了。我們深感遺憾的，對於這件大事的實際性質，及其具體措

施，能够作一番科學研究和客觀批判的，直到今天，似乎並不多見。教我們尤其所聞滿目所見的，不是「流亡難民協會」和「武裝還鄉團」諸公的武斷的聲討，一味的揮斥，和濫婦式的漫罵，便是中共及其附從者的不顧事實不問良心的宣傳叫囂，自矜自誇。

的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迫切的需求着一個徹底的整個的「大翻身」，也迫切的需求着一個規模宏大步調一致的「大翻身運動」。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這兩個內外魔鬼的高壓之下，呼吸窒息，肢體癱瘓，元氣漸喪，精神萎靡，已經到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淺，朝不保夕」的地步了。八年抗戰，終獲勝利，把日本法西斯強盜——這個最兇最大的死敵，逐出鴨綠江邊，台灣琉球，重入版圖，一雪馬關條約以來的奇恥大辱，這該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翻身」之日，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難以再得的復興之機了。真正「翻身」之道，在政治上應該廢止一黨專政，取消封建割據，讓人民在自由廣泛的基礎上，選擇政體產生政府。在經濟上應該停止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發展國家資本民族資本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而這些政治上

範圍——當然這是指和平時期的制度，並非指戰時的統制而言——遭受着政府的限制。整個社會保安方面自動組織的開拓工作——如醫院，共濟會等等——又是部分地被逐漸增加的國家事業所接收。然而在那裏，那是一個混合的制度，一部分是自動的，一部分是國家的，二者之間的一種合作。

雖然國家事業在逐漸增加，可是自動事業的努力，仍表現着繼續不斷的生機。這可說是民主政治正走上了一個新的境地。曾經對於改變農區生活極有貢獻的國立社會服務公會以及婦女協會，實在是一個好的預兆。

在這些社會的背後是這樣一種民族，雖然他們還有着相當社會的經濟的知識的差別，但這些差別却很快地消滅着。在他們之間，有重的產業稅，高的所得稅和附加稅，一個社會保安的擴大組織，一個教育制度，不但逐漸地向一切人供獻初等教育，而且供獻高等教育，這些東西都給政治的民主上，加添了社會與經濟的民主。

他們曾經成就了一個大的革命，雖然對於粗心的觀察者，它幾乎是看不見的。這個革命的範圍大部被其政治組織的延緩所隱蔽，並且，有一個世紀的工夫，被這個在大眾眼中幾乎是沒有變化的局面所隱蔽。所有主要的組織，例如，只能遙望着大臣們的意見行事的立憲君主，有着集合性的責任，並且對議會及其兩院負責的大臣的組織，世襲的貴族和被選舉的平民，文官，自地方產生的建立在英國早年歷史上劃定的地理區域上的獨立管理，并釋明法律而不受到政治管理或指揮的市政當局等，都仍保存着同樣的或幾乎是

經濟上的良好措施，先決的條件，在於國共兩黨，放下武裝，還軍於國，放下專政，還政於民，爭之於議堂，而不爭之於疆場，爭之於人民的舉手和鼓掌，而不爭之於「美式」或「蘇式」的砲聲雷鳴。

但是。一年來殘酷可怕的現實，完全背叛了我們人民的主張，完全粉碎了我們善良的理想，不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包括工農階級在內）的「翻身」不成，恐怕還要招致我們全民族全人民的萬劫不復的滅亡。

請先當中共所倡導和實行的「工農翻身運動」

第一，所謂「工農翻身運動」，正確的說，應該是指五十年來，落後社會所加諸工農身上的嚴緊的桎梏，今天得到合理的解除了。也就是說，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使趨於合理，趨於民主，以適合廣大人民的生存和榮華的需求。但這種「翻身」，是指對於落後社會的各種制度而言，絕對不是對於某一集團某一階層或者某一個人的人身肉體的報復而言，更不是說，「工農翻身」了，非工農的人輩，就應該為牛為馬，永遠被踐踏在腳板底下，亦如沒有「翻身」時的工農者然。照常理講，中共是「唯物論者」，主張「社會制度決定着個人的」，他應該比別人更懂得這個道理的。但是，痛心得很，他的實際行動是怎樣的呢？我們祇須看看隔江相望的蘇北解放區，即可知其梗概。不但擁有土地，擁有資金，成為殺頭活埋的最好的和有力的「罪狀」，即是僅免凍餓的中農，勤儉成家的富農，

小本經營的商人，和不參加解放區工作的知識份子，也變成坐牢、拷打、虐殺、活埋的一門爭對象了。我們再退一萬步來說，即是如何列寧所指示的：「對革命敵人的寬容，就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但也要找你們嘴裏的所謂「國特、三青、反動份子、頑固份子」等等的真正的「革命敵人」，並不能把頭腦中沒有「革命聖人——馬、恩、列、斯、毛」的人，或者頭腦中雖有「革命聖人——馬、恩、列、斯、毛」而不深刻的人，都不分清明白白，一列作爲「革命敵人」看待。

第二，解放區內實行的「工農翻身運動」，是包括着經濟上的「清算運動」，和政治上的「鬥爭運動」兩個具體的東西，但不論「清算」也好，「鬥爭」也好，總應該有個標準，有個尺度，有個範圍，有個條件，使清算的與被清算的，鬥爭的與被鬥爭的，有所遵循，有所適從。然而，中共是怎樣的呢？大至宇宙之大，小至蒼蠅之微，遠迄高曾祖時代的往事，無不在「清算」「鬥爭」之列。讓我舉幾個事例吧：一個地主的父親，在有皇帝的年代，吃了佃戶一隻雞蛋，這隻蛋孵化成鷄，鷄又生蛋，蛋再孵鷄，再以民主政府規定的二分拆息的複利算上去，拆合食糧，這一個地主應該拔出若干萬石的大米，田地房屋全部抵償，還不足還債，再對「翻身委員會」打出上萬石的欠條，這個「清算」工作才算完成了。一個小學教師，當做師範生的時候，於保衛大會上被高的吊起來了，鄉翻身委員會主任理直氣壯的宣佈：「他是望「中央」的，「中央」不來，我們不解。」一個抗屬老先生，長子於抗戰初期隨隊

同樣的立法上的權能。

只要更仔細地觀察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國家的組織改換得那麼大。在有歷史性的組織下，又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半公共性的官府組織，運用着立法及行政的權利——商會，煤業組合，電業代辦所，公共事業協會，例如倫敦運輸部，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其他許多組織。實際上，現在大部的立法事件，是在議會之外的。

內閣比較議會和地方政府更有權能，平民比貴族更有權力，官吏則比二者更有權利。

在壓迫前安協，實質改變了的時候，依然還保持着舊有的形式，在向前進展的當兒，永遠有一隻眼睛回頭過去，這就是英國進步的特徵。一直到現在，英國進步的主調，都還是自由與法律的規則，在法律上的平等，他們早就獲得了，選舉權上的平等，他們最近才獲得，而現在他們又趨向較大的——但並非完全的——經濟上與社會上的平等。

現在成爲風行的這種新民主政治，可能比較鞏固，因爲它是逐步地而且是極其謹慎地發展而成的。恐怕只有在這個幾近九百年沒有受到外力侵擾的島國上（這是別的国家所不會享受過的），這種發展才是可能的，而且恐怕在一些強大的文明國家間，也只有英國是曾經三百多年來未有過內戰，我們很難再找到類似的情形。

• 歡迎直接訂閱 •

一五五期

入川，後來參加青年志願軍，次子留在家鄉，參加了第四軍，勝利後長子寄了一張戎裝的照片家來，老先生思子情殷，把它貼在壁上，鬥爭大會上老先生也被吊起來了：「你一個兒子當「革命」，一個兒子當「頑固」，本來可以功罪相抵，但你的心不放在中間，偏在「頑固」那邊去了……」如此「清算」！如此「鬥爭」！嗚呼——我祇能用「嗚呼」兩字了！

第三，假如我們抽象的說：對於一個人，或者「掃事」，「清算」本來是好的，含有「去舊佈新」「濼垢揚清」之意。但這祇是抽象的說，具體的做呢？就困難得很。因為一要有個為社會所公認的「清算」的標準，或是公理，或是道德，或是法律；二要有個「清算」的範圍，或不究既往，或不誅心迹，或不談渺茫的將來；三要有個主持「清算」的人——這點我祇好「姑存一格」不敢「姑妄言之」了，因為我想不用「選舉」用「委派」或用其他什麼更好的產生方式。但總之，絕對不能以某一黨的黨義，黨章，黨綱，和黨紀，作為「清算」的標準和範圍，更不能以某一黨的黨員，作為「清算」的主持人，說得明白點，也就是絕對不能以中共的愛憎好惡，為對一切人一切事的「清算」的標準和尺度。舊年在滬，與白旭先生談及這個問題，白旭先生說：「中共的清算鬥爭運動，頗類於耶穌教中的「末日審判」，這是很確當的看法。中國共產黨這種「陸即真理」「陸即上帝」的武斷專橫的作風，實在到了瘋狂的可怕的程度了。」

第四，「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這不但在中國的政治上，是一個進步的良好的措施，也

是自洪秀全、孫中山從來，多少偉大的政治家，所努力追求的目的，中共的分配土地工作，我們自應擁護，但是我們反對把它作為騙取農民熱血頭顱的有利工具，尤其反對把它作為要求農民犧牲熱血頭顱的要挾口實。中共於「清算運動」分配土地之後，即進行大量的擴軍，「我給了你這麼多的田，你為什麼不去當兵？」在這種要挾之下，多少善良的農民青年，充當了可憐的內戰炮灰！

現在，我們再來談「還鄉運動」，也就是中共嘴裏的所謂「地主復辟運動」：

首先，我不能完全同意再生前幾期上「我自蘇北歸來」一文中所說的，「還鄉團」是地主豪紳、封建惡霸、地痞流氓、白面烟鬼和大小漢奸的集團。自然，事實教我們承認，上列各種漢奸，「還鄉團」中是佔着頗大的數字的，但事實也告訴我們，這中間是存在了勤苦的農民，忠實的百姓，和純潔無邪的小學教師知識青年等等，他們的確是為解放區的刑場和牢獄逼出來的。我有一位富農出身的親戚，也是「還鄉團」中的一份子，他會慘苦的也很懇懇的對我說：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懂得什麼「國特」「不「國特」，「反共」「不「反共」，一向守分安命，將力氣換飯吃了。但是，家裏終究登不下去了！和「翻身委員」接近，扛順氣旗吧，他要說我「假進步」；不接近吧，又說我看不起「泥腿子」來——「頑固」，「寧在世上天，不朝土里埋」，為了活命，祇好玉開一切，逃出來了。這個老實的農民，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不同意那位先生的過激之論，和皮毛之見。

但是，由於國民黨這個積垢已深的腐敗官僚機構，居於領導地位，在他的扶植和卵翼之下的組織，也跟着腐化官僚起來了。而且，「還鄉團」是國民黨用以反共的有力工具，就和共產黨對於「反項」的許多暴徒一樣，對於他們的違法作

惡，祇好裝聾作啞，放任不管。「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便宜的事情，踏破鐵鞋也無覓處的。

今天的「還鄉團」，已經成了：

第一，竹槓機關。「混水摸魚」，本來是我們的「國粹」之一，何況這中間又混雜着許多壞蛋，血還沒有榨乾的商人，鄉愚，便成為他們最好的對象了。

第二，殺人魔窟。被殺的對象，當然有「清算」「鬥爭」的英雄，但也有父親或祖父輩的仇人的後代，總之，「紅帽子」一戴，自然想不到什麼「審訊」或者「罪狀」了，並不減昔日的「翻身委員」或「政治委員」的威風。

第三，地主衙門。有的在倒「倒租」（解放區曾經有過佃農對地主的「倒租運動」），有的追陳賬，有的在捉佃戶的豬子，拆佃戶的房子，古話到底不差，真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現在烽烟遍地，砲聲震天，雙方集中力量，竭盡智能，宣稱在代表人民，為人民而戰，大有俗說：「不是魚死便是網破」之勢，其實雙方均置垂危的人民和垂危的祖國而不顧，到了最後，恐亦置自身的前途而不顧。

我們要大聲發問：

你們是不是永遠處於兩個極端，如水之與火，冰之與炭？假如你們能夠同時丟掉一己一黨的私利，拋開無謂的黨義，心平氣和的精誠協商，分析研究，就真的沒有接近的希望和可能嗎？你們開口人民，閉口人民，人民要你們這樣「翻」過來，「復」過去，鬧得雞犬不寧，天怒人怨，連做一個「會說話的牛馬」的資格，都沒有嗎？

我們要大聲發問：

中國共產黨的先生們！即是你們真的「翻身」了，但是被你們壓在腳下的那一羣人怎麼辦呢？他們不是和你們一樣的，要求「翻身」嗎？

